

滇缅边境学前儿童国家通用语言学习对儿童文化认同的影响及支持路径研究——以云南D乡为例

双升田 黎祖贤 李佳蓉 马伊琳

玉溪师范学院, 云南玉溪, 653100;

摘要:滇缅边境地区的学前儿童在国家通用语言学习与文化认同的构建中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 受限于当地多民族、多语言的环境, 学前儿童在语言学习上存在一定的障碍, 国家通用语言的掌握程度较低; 另一方面, 文化认同的缺乏使得他们在社会融合与自我认同上面临困境。为了解滇缅边境学前儿童国家通用语言学习现状及其对儿童文化认同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观察法、问卷法和访谈法等对云南省D乡学前儿童语言学习环境、幼儿园国家通用语言教育、家庭与社区语言学习支持进行调查, 调查发现学前儿童国家通用语言学习存在多语言环境挤压普通话使用空间、教育资源匮乏与教学模式固化、家庭与社区支持缺位、区域儿童早期语言能力发展受限等问题阻碍了学前儿童文化认同的提升, 通过分析从重塑双语融合的语言生态、打造专业化双语教育支持体系、激活家庭与社区的双言制功能、完善差异化的政策配套机制构建滇缅边境学前儿童基于国家通用语言学习的文化认同支持路径, 旨在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融合与文化传承, 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

关键词:滇缅边境; 学前教育; 国家通用语言; 文化认同

DOI: 10. 64216/3104-9702. 25. 03. 008

1 问题的提出

滇缅边境地区, 作为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区域, 拥有独特的文化背景和语言环境。学前儿童的语言学习面临着较为复杂的多语言环境, 其中, 国家通用语言的学习尤为关键。然而, 受限于地域、文化、教育资源等多方面因素, 国家通用语言的普及面临一定的挑战。与此同时, 教育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儿童文化认同^[1]。多民族文化的交汇为儿童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背景, 但也可能导致文化认同的模糊与冲突。因此, 探索滇缅边境地区学前儿童在国家通用语言学习与文化认同构建过程中的问题,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同时, 边疆地区学前儿童学习国家通用语言对文化认同的构建具有双向促进作用^[2]: 一方面, 国家通用语言作为文化纽带, 帮助儿童突破地域与民族语言的隔阂, 接触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资源, 在交流互动中增强对国家历史、价值观与共同体的认知, 从而深化“多元一体”的国家认同; 另一方面, 文化认同的建立又能激发儿童主动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的积极性, 形成“语言能力提升—文化理解加深—认同感强化”的良性循环。这种互动关系需以尊重民族文化多样性为前提, 通过科学的教育设计实现通用语言工具性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平衡, 既

促进社会融入, 又保护文化传承, 最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这一现状, 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与路径, 促进语言教育与文化认同的双重建设, 为边境地区的学前教育提供参考与借鉴。

2 D乡学前儿童国家通用语言学习现状

D乡位于云南省贡山县西部, 地处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地带, 北接西藏, 西、南与缅甸接壤, 是中国独龙族唯一的聚居地, D乡还以原始生态和民族文化著称, 拥有独特的语言文化传统, 民族主要以独龙族为主, 此外还有少量怒族、傈僳族。多语言和多民族环境使得儿童国家通用语的学习和掌握存在困难, 为了解D乡学前儿童国家通用语言学习现状, 主要通过问卷调查、社会实践等方式收集数据。问卷调查主要面向滇缅边境D乡的学前儿童家长、教师, 旨在了解当地语言学习的实际情况以及文化认同的现状。同时, 社会实践通过直接进入课堂与社区, 真实记录儿童在语言学习和文化认同形成过程中的表现与互动, 结合语言教育理论、文化认同理论及社会学的相关理论, 全面探讨语言与文化认同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学前教育的影响。

2.1 语言学习环境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象征,是人们所属群体最重要的认同标记之一^[3]。有研究指出语言环境的多样性确实影响了国家通用语言的推广效果,且国家通用语言的推广不仅仅是语言能力的提高,还涉及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层面的效应,其中包括增强民族团结和文化认同的作用^[4]。D 乡学前儿童的语言学习面临着独特的困境,主要源自多语言环境的影响。民族语言是当地儿童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主要语言,这种语言环境对学前儿童的国家通用语言学习构成了较大挑战。尤其在学前教育阶段,儿童的语言能力尚在发展中,语言的输入和输出受限于家庭和社区的 language 氛围,普及普通话的教学资源和环境相对匮乏。因此,许多儿童在进入小学前,普通话的听说能力普遍较弱,这对其学业表现和社会适应产生了影响。

表 1 幼儿最先会说的语言

语言类型	小计	比例
普通话	8	7.21%
汉语方言	5	4.5%
本民族语言	98	88.29%
其他	0	0%

表 2 幼儿日常使用语言

语言类型	小计	比例
普通话	32	28.83%
汉语方言	4	3.6%
本民族语言	75	67.57%
其他	0	0%

通过表 1 和表 2 的问卷调查研究,在边境地区,由于多元语言环境和民族文化的交织,国家通用语言的推广普及往往面临更为复杂的情境。因此,如何在保证民族语言传承的同时,推动普通话的普及,成为当前滇缅边境地区学前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

2.2 幼儿园国家通用语言教育

民族地区学前儿童国家通用语言教育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要从娃娃抓起”的关键环节^[5]。在滇缅边境地区,学前儿童国家通用语言教育的实施受到多重复杂因素的影响,既包括政策执行与资源分配,也涉及语言环境与文化冲突等深层次问题。一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硬件设施与教材匮乏。独龙族乡幼儿园普遍面临设施落后、教学资源不足的问题,依赖政府“一村一幼”项目,但部分幼教点仍存在师资不足、活动场地狭小等问题。

二是师资力量薄弱,教师语言能力与专业素养不足。幼儿园教师的国家通用语言水平参差不齐,部分教师自身发音不规范,难以提供高质量的语言示范。此外,教师缺乏游戏化、生活化教学策略的培训,导致课堂机械重复现象突出。三是多语言环境与文化冲突,独龙族多民族聚居,语言环境复杂。若过度强调国家通用语言,可能引发民族文化遗产的担忧;但若协调不足,又会导致儿童语言能力滞后,影响义务教育衔接。

2.3 家庭与社区语言学习支持

在 D 乡,家庭和社区在学前儿童国家通用语言学习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由于地区语言多样性和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家长和社区的支持对于儿童语言学习的效果有着直接影响。研究表明,家庭和社区的双重支持对于语言学习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能够有效弥补教育体系中的不足,帮助儿童在多语言环境中获得更好的语言适应能力和文化认同感^[6]。但调查发现,D 乡家庭语言环境与社区支持不足:一是家庭母语主导,多数家庭以民族语言或方言作为日常交流工具,儿童缺乏普通话使用场景。部分家长认为普通话“实用性不足”,更倾向优先学习民族语言或外语,这种文化认同的倾向无疑加剧了学前儿童语言学习的困难。二是政策落实的城乡差异,尽管国家推行“童语同音”计划和“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但乡村地区因财政投入不足、监管机制不完善,政策效果受限。例如,部分地区专项资金被挪用用于硬件建设,忽视教师培训等软性投入。

3 阻碍 D 乡学前儿童文化认同提升的国家通用语言学习的不利因素

3.1 多语言环境挤压普通话使用空间

D 乡的多语言环境对学前儿童国家通用语言学习形成了天然屏障。D 乡当地家庭与社区以独龙语、傈僳语等少数民族语言为主要交流工具,普通话仅在少数公共场合(如学校、政府机构)被动使用,儿童缺乏日常生活中的沉浸式语言输入。即本民族的第一语言防守机制、国家通用语言语料输入不足、语言互动情境有限、对中华文化理解欠缺导致普通话使用空间被挤压^[7]。例如,许多家庭中长辈因普通话能力有限,更倾向于用民族语言与儿童互动,导致儿童在学前教育阶段便形成“母语优先”的思维定式。这种语言环境的失衡不仅阻碍了儿童对普通话的习得,还强化了其对本民族文化的单一认

同。当国家通用语言无法成为文化表达的主流载体时，儿童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感知会逐渐弱化，形成文化认同的“内卷化”倾向，进一步加剧语言与文化的割裂。

3.2 教育资源匮乏与教学连贯体系缺乏

对少数民族学前儿童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教育，使其在接受义务教育前能够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进行沟通交流，形成国家通用语言思维习惯，为入学奠定良好的语言基础^[8]，然边境地区的教育资源短缺直接制约了国家通用语言的教学成效。以D乡为例，幼儿园普遍面临“一师多岗”的窘境，教师需同时承担普通话教学、民族语言辅助解释及基础学科启蒙等多重任务，但多数教师未接受系统的双语教学培训，难以设计符合多语言认知规律的教学方案。此外，教学设施陈旧，缺乏多媒体教具、普通话绘本等直观化学习资源，课堂多以机械跟读为主，儿童学习兴趣低下。教学体系上，教师常在“保护民族语言”与“强化普通话”之间摇摆：过度强调普通话可能导致儿童对民族文化的疏离感，而放任民族语言主导又会导致普通话教学流于形式。这种两难境地使得语言教育难以形成连贯体系，间接削弱了普通话作为文化认同桥梁的作用。

3.3 家庭与社区支持缺位

少数民族既是国家的公民，又是自己民族的成员，具有国家公民和族群成员的双重身份。这种复合身份使少数民族存在明显的双重认同倾向，即兼具在国家建构过程中形成的国家认同和在与其它民族交往过程中形成的民族认同^[9]，而语言是认同的根基。家庭与社区的语言观念和行动偏好，成为阻碍国家通用语言学习的隐性力量。调查显示，D乡90%以上的家长认为“民族语言是祖辈根基”，担心普通话普及会导致文化传统流失，因而在家庭教育中刻意回避普通话使用。例如，部分家长即使具备基础普通话能力，仍坚持用民族语言辅导孩子作业，导致儿童将普通话与“陌生”“正式”场景绑定，难以建立情感联结。社区层面，缺乏以普通话为媒介的文化活动（如国家节庆展演、普通话亲子阅读角），民族语言仍是集市、祭祀、节庆等公共场景的唯一语言。这种封闭的语言生态使儿童缺乏实践普通话的机会，若家庭与社区无法形成“双言制”支持，儿童的文化认同将长期局限于单一民族维度，难以适应主流社会的多元

互动需求。

3.4 儿童早期语言能力发展受限

学前阶段的语言基础薄弱，对儿童长期文化认同产生连锁负面影响。D乡儿童通常在进入幼儿园后才首次接触普通话，比城市儿童晚2~3年，且每日有效输入时间不足1小时。神经语言学研究表明，3-6岁是语言敏感期的黄金阶段，此时若缺乏足够刺激，儿童对非母语音系的辨听与模仿能力会显著下降^[10]。许多儿童因普通话听力理解困难，在课堂上陷入“听不懂—不敢说—不愿学”的恶性循环，不仅学业表现落后，还易产生“文化自卑”心理。更严重的是，语言能力滞后会限制其通过媒体、书籍等渠道接触主流文化，导致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符号（如国旗、国歌、历史故事）的认知模糊，文化认同的根基难以筑牢。

4 构建滇缅边境学前儿童基于国家通用语言学习的文化认同支持路径

4.1 重塑双语融合的语言生态

通过创设“民族语言—普通话”双轨并行的沉浸式环境，平衡语言输入与文化认同。例如，在幼儿园和社区推行“双语日”活动（如周一至周三普通话主导，周四至周五民族语言主导），利用民族节日嵌入普通话故事讲述（如用普通话演绎独龙族神话），既保留民族文化的根脉，又让普通话成为儿童情感表达的自然工具。同时，开发融合本地文化元素的普通话教材（如以独龙族纹样、傈僳族歌谣为内容载体的识字卡片），使儿童在语言学习中感知“民族特色”与“国家共性”的共生关系，提升儿童文化认同。

4.2 打造专业化双语教育支持体系

文化认同教育应当从学前教育阶段开始，幼儿园应当着力构建多层次的文化身份认同，培养儿童对所处文化的积极情感^[11]。建立“高校—政府—幼儿园”协同的师资培养机制，定向培训“文化转译型”教师，使其既能熟练运用普通话教学，又能借助民族语言进行跨文化阐释。强化教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核心素养和教学能力培训是促进教师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全面提升的行动方向^[12]。例如，依托师范院校开设“边境双语教育”专项课程，培养教师设计“语言对比游戏”（如普通话与独龙语词汇配对）、开发多媒体双语课件的能力。同时，政府需加大资源倾斜，为幼儿园配备智能语音设备、虚

拟现实(VR)文化体验工具,通过科技手段将普通话学习与沉浸式文化场景(如天安门升旗仪式、独龙族新年)结合,激发儿童兴趣,破解机械跟读困境^[13]。

4.3 激活家庭与社区的双言制功能

将国家通用语言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有机结合,使学前儿童在学习语言过程中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14]。因此,可以通过“激励+示范”双轨策略,推动家庭和社区成为普通话推广的“第二课堂”。例如,设立“普通话模范家庭”评选制度,对主动使用普通话沟通的家庭给予社区积分奖励(可兑换生活物资);在社区开设“普通话文化驿站”,组织家长与儿童共读国家通用语言绘本、共唱爱国儿歌,并邀请本地民族文化遗产人用普通话讲解传统技艺(如独龙毯编织),打破普通话与“陌生化”的刻板关联。此外,利用微信小程序搭建“云端双语社区”,定期推送普通话学习资源(如动画、儿歌),鼓励家庭在亲子互动中自然习得语言。

4.4 完善差异化的政策配套机制

确定并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是构建现代国家公民政治认同和建立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文化基础^[15]。制定“分层渐进”的语言教育政策,兼顾文化尊重与国家整合目标。例如,在教材编写上,采用“30%本土文化+70%国家通用文化”的内容比例,既展示独龙族英雄故事,也融入黄河、长城等国家符号;在教学评价上,摒弃“纯普通话达标”的单一指标,增设“文化理解力”考核(如用普通话复述民族传说)。同时,建立“社区—学校”协商平台,允许教师在课堂中适度使用民族语言辅助解释抽象概念,避免政策执行中的文化冲突,增强儿童对普通话的亲近感。

参考文献

- [1] 赵名扬,李旭,杨金字. “位育”视域下乡村儿童文化认同教育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J].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23,39(09):36-42.
- [2] 阿巴拜克热·买买提. 南疆地区少数民族青少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J]. 边疆经济与文化,2024,(09):110-118.
- [3] 毕媛媛. 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的语言政策与认同研究[D]. 云南大学,2019.
- [4] 袁世梅,杨丽萍,李春忠. 多民族互嵌式社区国家通

用语言推广现状调查研究——以兰坪县永昌社区为例[J]. 普洱学院学报,2025,41(01):99-106.

[5] 楚琳,李清华,史大胜,等. 民族地区学前儿童国家通用语言教育的价值意蕴、实践进路与制度优势[J].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51(01):168-175.

[6] 王诗琦,曹欣,蓝海天,等. 传统文化认同对小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影响:自我效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链式中介作用[J].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5(01):75-80.

[7] 孙广颖,李姍泽. 民族地区学前儿童国家通用语言教育质量提升困境及突破——基于浮现理论视角[J]. 民族教育研究,2024,35(01):133-140.

[8] 李瑞华,徐福,陈婷丽. 我国少数民族学前儿童国家通用语言教育:政策干预与实践思考[J]. 民族教育研究,2021,32(04):57-64.

[9] 姜艾伽. 国家通用语言对国民认同塑造探析[D]. 吉林大学,2023.

[10] Mayberry, R. I., & Lock, E.. Age constraint on first versus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Evidence for linguistic plasticity and epigenesis. Brain and Language, 87(3), 369-384.

[11] 潘月娟,吴霓雯,刘姍姍,等. 《学前儿童文化认同量表》编制及其信效度检验[J]. 幼儿教育,2019,(33):37-41.

[12] 蔡红梅,马文香. 民族地区学前教师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研究[J]. 青海民族研究,2023,34(02):110-117.

[13] 黄慧精. 虚拟现实技术(VR)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与推广中的创新研究[J]. 信息与电脑(理论版),2022,34(23):253-256.

[14] 贾媛. 民族地区学前国家通用语言教育实施经验和策略研究[J]. 民族语文,2024,(06):17-26.

[15] 菅志翔,马戎. 语言、民族国家建构和国家语言政策[J]. 学术月刊,2022,54(09):123-147.

课题: a. 云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云南民族地区学前儿童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提升策略研究》(项目编号: S20241139044); b. 玉溪师范学院一流课程建设示范项目《学前儿童语言教育》(2022kc14)